

新世纪文艺学美学建设丛书



俄苏文论十八题

E'SU WENLUN SHIBATI



邱运华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邱运华，1962年生，祖籍湖南，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先后师从陈寿朋先生、程正民先生，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俄苏文论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诗学。个人代表著作：《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19-20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蒲宁评传》。代表论文有：《托尔斯泰带来的阐释困境》、《民间创作研究：俄罗斯文艺学的起点》、《外位性与巴赫金文艺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世界文学概念的确立与跨民族文学研究的站位问题》等。

ISBN 978-7-5336-5208-1

定价：28.00元



俄苏文论十八题

E'SU WENLUN SHIBATI



邱运华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苏文论十八题/邱运华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1

(新世纪文艺美学建设丛书)

ISBN 978 - 7 - 5336 - 5208 - 1

I. 俄… II. 邱… III. ①文学研究—俄罗斯②文学研究—
苏联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130 号

责任编辑:殷振群

装帧设计:许海波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50 000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序 言

尊重老一辈文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弘扬他们的学术精神，是我们的责任。作为先生罗英先生的弟子和学生，我们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但是我们深入研究先生的思想，研究先生的学术，也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先生的学识渊博，他的著作涉及广泛，他的研究方法独特，他的学术思想深邃，他的学术观点新颖，他的学术贡献巨大，他的学术影响深远，他的学术地位崇高，他的学术价值难以估量。因此，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身体健康要讲究营养，可是光讲究营养还不行，还要重视营养平衡，不能偏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论的发展，要植根于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要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和文论中吸收营养，这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问题是如何拿来？拿来需要有眼光，会择取，同时还要重视营养平衡。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它们的关系应当是取长补短、是对话关系。因此，在吸收外国文学和文论时，决不能扬此抑彼，决不能一边倒，决不能偏食，而要做到营养平衡，这样才会有利于本国、本民族文学和文论健康发展，在这方面，“五四”一代文学家和文论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鲁迅对外国文学和文论的吸收就很重视营养平衡，就没有偏食，他既重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不排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他既介绍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介绍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我同老师钟敬文先生的接触中，我也有这方面的深切体会。作为“五四”一代学人，作为我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奠基者，钟先生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民俗学非常熟悉，同时，借助日本文化也非常了解苏联的民俗学。他不仅熟悉苏联著名的民俗学家普罗普的名著《故事形态学》，同时也了解很少为人所知另一本专著《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他告诉自己的学生后一本著作更为重要，前者解决故事是什么，后者解决故事是怎么来的，两者相加才是完整的故事学研究。显然，老一代学者在吸收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力，他们从不偏食，从不一边倒，所以才能海纳百川，成为一代宗师。

遗憾的是，我们的外国文学和文论的翻译及研究并没有完全沿着先辈们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在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反复出现偏食的现象。解放后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我们的外国文学和文论的翻译及研究也完全倒向苏联一家，其中当然也介绍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文论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

论,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二流、爱情片、乃至三流的作品和论著,甚至还常常把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文论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待,这就完全带坏了国人的胃口,阻碍了我国文学和文论的健康发展;新时期开始,我们还来不及克服这种极端,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这时,西方文学和文论像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有人指出我们几乎十年内走完西方文论的百年历程,这当然对我国文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相比之下,俄苏文学和文论却被大大冷落了,苏联文论被一些人斥之为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人们不再言必称别·车·杜,言必称列宁、普列汉诺夫,而是满口的荣格、弗洛伊德,满口的伊格尔顿、杰姆逊,这种情景的出现固然由于思想的偏狭和好走极端,也因为我们对 20 世纪俄苏文论的发展不甚了解。由于种种原因,以前我们对 20 世纪俄苏文论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只知道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了解俄苏文论的其他流派,也不了解俄苏文论的最新进展。实际上,20 世纪俄苏文论是丰富多彩的,出现了许多对世界文论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流派。除了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有被西方视为 20 世纪文论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有享有世界声誉的巴赫金诗学理论,有对西方叙事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普洛普故事形态学,还有在国际结构符号学研究中独树一帜、有广泛影响的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等等。更值得重视的是,20 世纪俄苏文论面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挑战,一直坚持俄罗斯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同时也不简单排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且出现了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同文化语境研究相结合、形式结构同历史文化研究相贯通、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相融化的趋势。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利哈乔夫就指出:“在俄罗斯的结构主义研究系统中越来越顽强地流露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归根到底将结构主义变成非结构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摧毁着结构主义,同时又允许从中吸收最好的因素。”^①俄罗斯著名的结构—符号学文论家洛特曼对作品进行研究时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们在同一些复杂的结构(艺术正属于此列)打交道时,由于这种结构具有多重性,对它进行共时性描述一般说是非常困难的。了解这种结构的先前状况,是对它成功地进行模式化的必要条件。因此,结构主义并非是历史主义的敌人。不

^① 利哈乔夫:《关于文学研究的思考》,见《解读俄罗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15 页。

仅如此,认识到个别的作品(艺术结构)是更为复杂的统一体的成分之一,是当今最迫切的任务,而这个复杂的统一体就是文化、历史。”^①俄苏文论这种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相融合趋势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一些西方文论重结构形式、忽视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形成一种互补,也为文艺学的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空间。

学术界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研究俄苏文学和文论方面的学者,在看到介绍和研究外国文论出现的偏颇时,这些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俄苏文论方面做了很大努力。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国内先后出版了斯托洛维奇、卡冈、鲍列夫的美学著作,出版了形式主义文论、巴赫金的六卷集、洛特曼的专著、赫拉普琴科的选集,最近又出版了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也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关于艺术的对话》和《艺术及其最新形式》、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文论教科书方面新近也出版了哈利泽夫的《文学学导论》。在译介有世界影响的俄苏文论专著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研究巴赫金、俄国形式主义、洛特曼、卢那察尔斯基的专著和为数不少的研究论文,摆在我们面前的邱运华的《俄苏文论十八题》就是其中的一种。一系列译著和专著的出现,对于纠正吸收外国文论出现的偏食现象,对于全面了解俄苏文论的新进展,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力求在融合中西文论基础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个时期以来,在俄苏文论相对被冷落的情况下,邱运华同国内研究俄苏文学和文论的中青年学者一起,孜孜不倦地介绍和研究俄苏文学和文论,他先后出版了《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19—20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等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理论价值的论文,《俄苏文论十八题》就集中了近年来研究俄苏文学与文论的成果。这本专著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内容具有创新性,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有新的独到的阐述。巴赫金的文论是这本专著的研究重点,但作者并没有去重复国内已有的研究论著的论题,而是从新的角度展开研究,其中关于“外位性理论”的研究国内很少有人深入进行。专著对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① 洛特曼:《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见《洛特曼文集》,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759页。

进行比较深入的阐发，并拿它同西方的主体间性理论进行比较，指出外位性理论是巴赫金文艺学活动为核心的理论，是巴赫金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这种看法对巴赫金的研究应当说有新的开拓。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作者也没有去重复国内教科书的老生常谈，而对长期被压抑和被冷落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情有独钟，别开生面地阐发了布哈林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中介和形式内涵的论述以及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这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鲜明的当代意识。专著的研究对象都是历史上的文论大家，他们的理论都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作者在研究这些人物时，一方面很重视他们的历史理论，另一方面也特别重视从现实问题出发，用现代的眼光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梳理，挖掘其理论价值，阐发它的当代意义，表现出很强的当代意识和问题意识。其中，巴赫金文艺学学科建设思想对文艺学学科的意义、巴赫金和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思想对于增强当下文论建设历史意识的意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文化理论对当代文化研究的意义等重要问题，作者都在书中有意识地展开深入的阐发。让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照面，让理论问题在同现实的碰撞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作者的研究努力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性品格。

近年来，国内老一代俄苏文学和文论的翻译家及研究学者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可喜的是年青一代翻译家和学者已经涌现出来。他们继承老一代的传统，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气象，他们具有世界眼光，视野开阔，思想敏锐，俄语和俄苏文学专业知识扎实，特别是具有很好的理论素养，正在成长为俄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邱运华正是其中的一员。我真诚地期望他们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把俄苏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2007年3月4日春雨中

目 录

序 言	(程正民)	001
外位性理论与巴赫金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001
一、研究者对巴赫金外位性理论的评论		002
二、外位性理论的表述贯穿了巴赫金的全部学术活动		007
三、巴赫金外位性理论的基本内涵		016
四、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外位性理论		023
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学说与文艺学研究的视野拓展		028
一、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概念的语境		030
二、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的术语体系		031
三、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立场		033
四、整合和拓展：巴赫金“意识形态学说”的价值		035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与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039
一、超语言学：一种批判理论		040
二、话语的狂欢与独吟		044
三、错会的契合：解构文论与巴赫金的被发现		046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语建构问题		
一、巴赫金的艺术交往话语的价值		050
二、生活和艺术：两套话语交流和对话		052
三、话语理论与审美语境的多元空间		057
三、建立“审美活动场”		060
巴赫金关于文艺学学科建设思想的再度阐释		062
一、言谈建构的文本：“文艺学家”身份与研究的边界		062
二、巴赫金对文艺学学科的基本思想		065
三、巴赫金文艺学思想的根本精神		072

维谢洛夫斯基和巴赫金对民间创作研究比较论	076
一、从“主义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转向	077
二、维谢洛夫斯基：民间起点和诗学的历史视野	080
三、巴赫金：发掘民间立场的意识形态视野	084
四、为什么是民间创作研究	087
“世界文学”概念的建立与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站位问题	090
一、跨民族文学研究的出现以及不同文化站位问题的提出 ..	091
二、三种不同的文化站位及其话语权力模式	094
三、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和“他文化的眼睛”的意义	098
四、如何理解跨民族文学研究的文化站位	102
求索“文学性”：跨文化种类话语的文艺学研究对象问题.....	105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研究对象困惑	105
二、文学性：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意义上的	107
三、文学性：一种艺术结构的建构	109
四、文学性：跨文化种类话语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111
“历史诗学”的两套理路与文论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问题	114
一、求证历史：维谢罗夫斯基的历史诗学	114
二、巴赫金：发掘历史诗学中的民间立场	118
三、赫拉普钦科：构建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	120
四、当下文论建设中的历史意识问题	125
诗性体裁及其文化意识的积淀	129
一、“文化”与“诗学”中介的载体研究	129
二、关于“诗性体裁”概念	132
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体裁实践的文化意识	136
四、体裁的文化意识是一个变化中相对稳定的结构	138
五、结语	141
诠释的困境：20世纪初的托尔斯泰话题	142
一、作为诠释对象的 20 世纪初的托尔斯泰话题	143

二、诠释的多维语境	148
三、文学阐释：该说什么？	155
十九世纪俄国思想文化语境与托尔斯泰小说诗学 的启示特色	158
一、回归俄罗斯，回归神圣使命	159
二、诗性启示的审美建构	162
三、转向的美学意味	167
诗性启示：列夫·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根本特征	169
一、启示：生命的微光	169
二、诗性启示的本质	171
三、人的立场：启示诗化的契机	174
四、启示的历史语境	176
五、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的个性特色	180
论列夫·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的象征	184
一、象征的两个维度	184
二、托尔斯泰启示诗学与俄罗斯民族诗学传统	185
三、启示诗学与象征的宿命超越	192
四、静观：归宿抑或起点？	194
问题与主义：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研究	197
一、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199
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	202
三、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艺”学说的评述	208
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中介与形式内涵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文艺问题	212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界下的文艺问题”	213
二、布哈林提出的基本问题	214
三、对意识形态的分层及其理论价值	218
四、艺术形式的社会学研究	221
“无产阶级文化”，作为一个问题	
——兼论葛兰西对布哈林的批评	227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问题	227

二、关于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策略问题	231
三、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学说与列宁、托洛斯基的关系问题	236
四、布哈林与葛兰西：现实影响与批评	238
现代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高尔基典型论	
——30年代周扬、胡风之争与典型说论辩	242
一、高尔基典型论原始形态和现代中国文论的建设者们对它的接受	243
二、典型塑造的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之争	245
三、周胡之争与“革命文学”的理论背景	248
四、典型理论的现代延伸	252
后记	254

外位性理论与巴赫金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①

在当下的文艺学研究领域,巴赫金的文艺学研究(他的对话观念、复调理论和文化诗学等)已经为学术界经常引用甚至作为方法论基础。目前所见对巴赫金的研究著作中,^②对巴赫金文艺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然而,很遗憾的是,关于巴赫金自己从事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却鲜有论述。我认为,在巴赫金的文艺学研究活动中,最核心和根本性的理论乃是外位性(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ь,也有翻译为“外在性”)理论。可以说,外位性理论既贯穿了他的学术活动全过程,又渗透在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述中,成为其中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出发点。例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的研究,作为这个研究核心和基础的理论观点对话学说和复调小说理论,就是建立在外位性理论基础上;对拉伯雷《巨人传》的研究所强调的狂欢化特征,最广义上的对话观点,就是建立在对充分多样化的他者话语的肯定基础上。在这两部重要著作中作为根本的历史—一体裁诗学理论,也包含着这个思想。从巴赫金理论阐述的理路来看,外位性理论在他早期的著作《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这部大型理论著作,到他晚

① 本文的主体部分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限于篇幅删去一部分,现予以补上。

② 见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张杰《复调小说理论研究》、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张开焱《开放人格:巴赫金》等,包括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以及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它》和《批评的批评》等著作。应该说明一点,凌建侯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巴赫金哲学思想研究》(未出版)已经涉及到哲学基础问题。

期的论文《答〈新世界〉编辑部》都有比较清晰的论述。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理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梳理,以便揭示巴赫金文学研究的哲学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一、研究者对巴赫金外位性理论的评论

随着巴赫金在东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声誉鹊起,外位性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对象。

刘康把外位性看作巴赫金美学理论的建立(作者与主角的对话)中的一个环节。他说:“美学在主体建构论中起了什么作用?巴赫金主要是从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考虑的。他把这种关系分为四类:1. 伦理的事件;2. 认知的事件;3. 宗教的事件;4. 审美的事件。在伦理事件中,两个意识是同一的,作者就是主角,或者说即是我,我的行为即我自身。在认知事件中,作者要获得的是抽象真理,而不是另一个意识,因此主角的意识是无足轻重的。在宗教事件中,两个意识同时存在,^①但他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一个君临一切,一个俯首听命。只有在审美事件中,作者和主角的两个意识才能在平等的价值交换位置上同时存在。”他的这个理解基本上抓住了巴赫金审美理论在“我与他人话语”这个问题上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但是,刘康对外位性的理解,我以为有不确切的地方。他这样说:“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作者)却力图克服这种生活中的主体在伦理和认识意义上观察别人、观察自我的片面性。审美主体(作者)力求全面、整体地把握主体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把握生活主体(主角)的全部,从而把握自己,在与主角的价值交换——对话中创造、建构出完美的主体。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怎样才能全面把握主角呢?这要通过主体的‘视域剩余’、‘外在性’和‘超在性’三个条件来实现。”在这里,刘康对外位性理解有些偏差。一、“视域剩余”是外位性的前提:正因为

^①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② 同上,第65—66页。

存在着“我”和“他人”的不完整性，我不是完整的我，他人也不是完整的他人，所以，走出我（他人）的局限，用他者的眼光来看我（他人），外位性才成为必要。二、“视域剩余”、“外在性”和“超在性（трансгредиентность）”具有一种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超在性”也就是外位性立场。三、刘康以“视域剩余”作为外位性的原因：假如我们希望完整地看到对方看不到的地方，那么，就必须借助他人的眼光，“视域剩余构成了主体观察世界时的外在性（即外位性——引者）。”^①刘康界定说，“外在性是指主体的自我对于他者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的外在。……外在性是审美过程之中作者创造主角的根本条件”。^②不是“主体的自我对于他者”，而是主体跳出自我，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关于这一点，巴赫金在《镜中人》（1943）里说：“在自己与自己的相互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透露出虚伪和谎言。思想，感情的外化形象，心灵的外化形象。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我被他人控制着。这里没有内在和外在相结合的那种幼稚的完整性。窥视背靠背构建的自身形象。在镜中的形象里，自己和他人是幼稚的结合。我没有从外部看自己的视点，我没有办法接近自己内心的形象。是他人的眼睛透过我的眼睛来观察。”^③当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时候，我的主体性并没有消失。做到这一点，在伦理事件和认知事件中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恰恰在审美事件中具有本质的价值。

在凯特琳娜·克拉拉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的《米哈依尔·巴赫金》一书里，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作为独特的变易者，我的自为的我总是不可见的。为了观察到这个自我，必须找到能够确定它的表现范畴，这只能得自于他人。因而，当我完成了他人，或当他人完成了我之时，他与我实际上便交换了一个可见的自我。这就是巴赫金的观点，他争论说，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自我；我得到一个我可以看到、把

①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 同上，第66页。

③ 巴赫金：《镜中人》，《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握和运用的自我，方法是将我本来不可见的（不可把握的、不可利用的）自我置于完成的范畴中，这些范畴我得自他人关于我的认识。与拉康相反，巴赫金认为镜像阶段与意识共始终；它没有结束，只要我们仍处于创造自我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用以观看自我的镜子不是被动的反射镜，而是他人的主动折射的棱镜。为了成为我，我需要他人。这样，完成又可以是好事。”^①这个理解，可以说抓住了外位性的基本原理。他人成为自我完整存在的先决条件；同样，我也成为他人完整存在的先决条件。人的完整存在是在意识的把握中的，但是，这个意识要把握主体自我，却必须换位为他人，利用他人的视野（既可能是一个他人的视野，例如主人公；也可以是整个世界的视野，例如一种文化语境）。不过，凯特琳娜·克拉拉和迈克尔·霍奎斯特把这个思想根源归结于宗教和神学因素，我以为则未必。“他是我的你”——这种共识只能看作文化上的呼应，而不具有宗教神学理论直接原因的关系。

相比之下，孔金和孔金娜的看法是接近本质的。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是与《论行为哲学》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从作为一个与之相关的负责任的人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艺术创作活动。”^②在后一部作品里，巴赫金就得出了“我与他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思想，并以之来批判现实行为。他说：“现实的行为世界所遵循的最高建构原则，就是在我与他人之间在具体的建构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生活中存在原则上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价值中心，即自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一切具体的生活要素都围绕这两个中心配置和分布。内容不变的同一个事物，生活的同一个因素，视其同我或他人相联系而获得不同的价值。内容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视其同我或同他人相联系而获得完全不同的情感意志语调，在自己最积极最重要的涵义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这并不破坏世界在涵义上的统一性，却可使涵

^① 凯特琳娜·克拉拉、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依尔·巴赫金》，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② 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张杰、万海松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85页。

义的统一性提高到事件的唯一性。”^①他强调，“审美观照正意味着把事物投入他人的价值层面中去。”“世界在价值上通过建构而如此一分为二，区别开我同我眼中之一切他人，这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偶然性的区分，而是积极的应有的区分。……每一个有道德的行为，无不在实现着这种建构上的区别，这种区别甚至连起码的道德意识都可以理解。”^②我以为，在此段论述中，体现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的真实动机。当然，孔金、孔金娜的传记并非专门的理论研究著作，不可能继续集中研究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把“我与他人”的价值的区分放在巴赫金哲学的前提来考虑，则应该说是独具慧眼的。

王建刚承认，“作为对世界本质的界说，对话性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③这当然是正确的。他在论述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理路时，建立了对话与狂欢之间的理论联系，具有相当的理论严密性，但在总结“他人”理论的渊源后，却得出“对他人的发现是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一大杰作”。^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自我”与“他人”既具有宗教神学上（例如犹太教文化）的渊源，也可以索隐到柏拉图对话中的叙事学因素存在的必然要求。无论如何，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或者存在主义的唯一资源。另外，外位性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主要理论资源为王建刚著作所注意。

董小英在讨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著作中，把对话的基础归结为“他者与他人话语”，并认为巴赫金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哲学的角度、从审美过程切入到对话性的本质”的，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⑤她由镜像理论进入到话语理论，对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解读。但是，面对我们所提出的外位性理论，她并没有做更多的阐释；也没有把外位性理论与巴赫金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

^① 巴赫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② 同上，第74页。

^③ 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④ 同上，第49页。

^⑤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页。